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中国上古史纲

王玉哲 著



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

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

中国上古史纲

王玉哲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上古史纲 / 王玉哲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4

(津沽名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7-310-05784-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上古史—研究 IV. ①K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122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北京隆晖伟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8 插页 223 千字

定价: 7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王玉哲先生(1913—2005)

“貞，人戡(歲)、^燕斃于丁。九月。”(Y 241)

这两例句同是“斃”人以祭。第一例“人”在“斃”后，第二例则“人”在“歲”(刺殺)与“斃”(割解)之前。

另外，为了^说证明“鬼”为被斃的对象，我们不妨再举^{几条}卜辞~~(于)~~，以资证明：

“辛卯……^斃鬼，^隹鬯乎竹斃鬼。”(合集1109正)

“……^斃鬼，^隹鬯乎竹斃鬼。”(合集1111正)

“^斃鬼，^隹鬯乎竹斃鬼。”(合集1110正；存-616)

这三例中“斃”字后之字，我怀疑都是“鬼”字的异文①。这就可以证明“鬼方”为商人的敌对者，故以其战俘为祭牲。

总之，前所录的五条有关鬼方的记载，都是商人伐鬼方在卜辞中的反映。也只有这样解释才与古文献记载相合。其中有“鬼

出版说明

津沽大地，物华天宝，人才辈出，人文称盛。

津沽有独特之历史，优良之学风。自近代以来，中西交流，古今融合，天津开风气之先，学术亦渐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院系调整，学科重组，南北学人汇聚天津，成一时之盛。诸多学人以学术为生命，孜孜矻矻，埋首著述，成果丰硕，蔚为大观。

为全面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天津学术发展的面貌及成果，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津沽名家文库”。文库的作者均为某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所收录的著作或集大成，或开先河，或启新篇，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论著的价值已经从单纯的学术层面生发出新的内涵，其中蕴含的创新思想、治学精神，比学术本身意义更为丰富，也更具普遍性，因而更值得研究与纪念。就学术本身而论，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常研常新的题目，这些可以回答当今社会大众所关注话题的观点，又何尝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道路点亮了一盏盏明灯。

这些著作首版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十年来多未曾再版，既为学林憾事，亦有薪火难传之虞。在当前坚定文化自信、倡导学术创新、建设学习强国的背景下，对经典学术著作的回顾

与整理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次出版的“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包含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五个学科的名家著作，既有鲜明的学科特征，又体现出学科之间的交叉互通，同时具有向社会大众传播的可读性。具体书目包括温公颐《中国古代逻辑史》、马汉麟《古代汉语读本》、刘叔新《词汇学与词典学问题研究》、顾随《顾随文集》、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雷石榆《日本文学简史》、朱一玄《红楼梦人物谱》、王达津《唐诗丛考》、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漆侠《宋代经济史》、来新夏《古籍整理讲义》、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季陶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杨敬年《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王亘坚《经济杠杆论》等共二十种。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的更新和学科的进步，某些领域已经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对于著作中的部分观点还需在阅读中辩证看待。同时，由于出版年代的局限，原书在用词用语、标点使用、行文体例等方面有不符合当前规范要求的地方。本次影印出版本着尊重原著原貌、保存原版本完整性的原则，除对个别问题做了技术性处理外，一律遵从原文，未予更动；为优化版本价值，订正和弥补了原书中因排版印刷问题造成的错漏。

本次出版，我们特别约请了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为每部著作撰写导读文章，介绍作者的生平、学术建树及著作的内容、特点和价值，以使读者了解背景、源流、思路、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原作、获得启发。在此，我们对拨冗惠赐导读文章的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同时，我们铭感于作者家属对本丛书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

创造条件，帮助我们搜集资料、推荐导读作者，使本丛书得以顺利问世。

最后，感谢天津市重点出版扶持项目领导小组的关心支持。希望本丛书能不负所望，为彰显天津的学术文化地位、推动天津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贡献，为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中国上古史纲》导读

赵伯雄

先师王玉哲先生所撰《中国上古史纲》初版于 1959 年，至今已近六十年了。明年适逢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南开大学出版社计划再版先生的这部著作，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先师的女公子兰珍、公子兰仲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自忖学力、识见均不足以担此重任，心中惴惴，犹豫再三。然而作为弟子，将老师的著作向世人做一介绍，又是责无旁贷的。于是鼓起勇气，不避浅陋之讥，将我读过先生此书的一点儿认识和体会写了下来，就教于当世学者。至于出版社编辑提出的要对这部书做出“专业评价”，则吾岂敢。

先师讳玉哲，字维商，河北深县人。生于 1913 年，卒于 2005 年。先生系农家子弟，早年曾接受过当时的所谓新式教育，在高中阶段，就对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6 年，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期间，受顾颉刚、钱穆等先生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古史研究的道路。不久，日寇全面侵华，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后迁至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先是与同学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长沙，后又参加“步行团”，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大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先生自述，在西南联大期间，曾广泛修

习文史各类课程，学中国哲学史于冯友兰先生，学《庄子》于刘文典先生，学《诗经》《楚辞》于闻一多先生，学声韵、训诂于罗常培、魏建功先生，学甲骨文、金文于唐兰、陈梦家先生。正是由于有这些学术前辈的指引、教导，先生的学术功底日益深厚宽博，这为他日后的中国古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先生在西南联大毕业，旋即考取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是唐兰先生。经过三年刻苦学习，1943年，先生研究生毕业，他的硕士论文《狶狶考》获得了答辩委员的一致肯定和赞赏。

1943年以后，先生先后在武汉华中大学、长沙国立湖南大学教书数年，其间所撰论文《鬼方考》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金。1948年，先生北上天津，侍疾于父亲病榻之侧，此时接受了南开大学的聘书。仅仅半年之后，天津解放，从此先生再没有离开过南开。他在这里教书、治学，兢兢业业，成为中国享有盛誉的先秦史专家，同时也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勤勉刻苦，直至耄耋之年，仍旧笔耕不辍，可以说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学术和教育事业。

这本《中国上古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就是王玉哲先生根据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上古史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当年先生讲中国上古史，是作为中国通史课程的一个段落来讲授的，故《史纲》虽断代于秦，其实具有通史的性质。通史贵在贯通，贵在全面，而且立论要求尽量稳妥，今观《史纲》，正是具有这样的特点。本书从原始社会讲起，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的统一，举凡中华文明的起源、华夏民族的形成、各时期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民族关系、思想观念、文化

发展、科技成就，均有涉及。内容虽然丰富，全书却仅有二十余万字，我想这与此书本来是为大学生授课的讲稿有关。作为上课用的讲义，必须简明，不能枝蔓太多，不能论证过细，先生当年以“史纲”命名此书，大约就有这层意思吧。

先生为文，求真求实，从来不发空论，而且心思细密，所见常常出人意料。我看过一些先生早年的作品，大多是考证文章，写得十分精彩，旁征博引，追求实证，每立一说，必广泛搜求各方面证据，论证如剥茧抽丝，所以结论往往令人信服。这种风格，在先生晚年的文章中依然可以看到。先生说最欣赏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贯穿他学术活动的始终。

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史纲》，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长于考证、实事求是的特点。许多立论和观点，都是先生精心推寻考证的结果，诸如商代的继统法、先秦的民族问题、西周的社会性质、楚族的来源及迁徙路线等问题，都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做基础，故全书内容颇显扎实厚重。当然，限于通史教材的体例，有些论点不可能充分展开论证，即使这样，作者往往也要将证据的要点一一列出，以备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之用。例如讲到中国上古存在过母系氏族社会，就列举了上古“知其母，不知其父”“族外婚”“古时婿称岳父为舅；称岳母为姑；妇称丈夫之父为舅；称丈夫之母姑”“父子不相续相处，而祖孙相续相处”“古帝王称‘毓’称‘后’”“图腾痕迹”“姓的性质”等七个方面的证据，来说明中国上古确曾存在过母系氏族社会。这七项证据，如果详细论证，每一项都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但在《史纲》中，则只做了简要的概述，然而言必有据、论不空发的精神已跃然纸上。

写这种通史性的著作，善于考证，固然是一大优长，但懂得裁断，同样重要。因为事实上，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并不是对

每一个史实的认定及提法都要列举出种种证据的，哪些该详，哪些可略，全在作者的裁断。在《史纲》中，先生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很能给人以启发。例如旧说商人的祖先“不常厥邑”，从契到汤曾有“八迁”。我知道先生对这个问题曾做过深入的考证，但在《史纲》里，先生只是概括地引用王国维的考证结果，指出八迁之地，“或不出山东、河北与河南之间”，而不是为了炫博，在这个并非重要的问题上浪费笔墨。这就叫作善于裁断。有些问题，受材料的限制，目前尚无法说得十分清楚，如果是写学术论文，进行深入的探索或者据理推测，都还是可取的，但在这类通史性的著作里则不宜详细考论。例如讲商代的职官，《史纲》就仅仅列举见于卜辞的“臣”“小臣”“多亚”“尹”等二十余个官名，并不加深论，理由是“以上这些官名，其具体的职掌及其相互关系，还不很清楚”，这既反映了那个时候学者的认识水平，也符合《史纲》的写作体例。这也是一种裁断。有时为求简明，往往将考证的线索放在页下附注之中。如周初的“三监”，学者间颇多聚讼，至今也难有明确的结论。《史纲》只在正文中略述通行的旧说，然后用附注的形式，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作者所赞成的王国维的考证结果。关于周公称王之事也是如此。武王死后，周公是否践位称王，古来争议甚多，莫衷一是。《史纲》正文对此不做纠缠，直言周公“践天子位”，然后在附注中详述立说的根据。之类的处理，都反映出作者具有对史事权衡轻重以及取舍裁断的史识。

先生对自古流传的旧说，每多考而后信。但在没有确实可信的新结论的情况下，则宁肯沿用旧说，也不追新骛奇，不在证据尚欠充足时改立新说，表现出一位治史者应有的审慎态度。当然，不肯矜奇立异，并不意味着盲从旧说。对某些在古代属于非主流的说法，经过细致的辨析，有时也会改从。对于今日已有确

凿证据证明是误说的，也会加以纠正。例如两周之间的“共和行政”，自来说者多取《史记》，以为是周公和召公的联合行政；而《竹书纪年》记此事，则称是共国之君名和者干王位。先生通过考证，认为《竹书纪年》之说更为合理，遂在叙述此事时摒弃了《史记》的说法，而改用《竹书纪年》之说。又如古人一般视华夏民族之外的“蛮夷戎狄”为四个种族，并将此四者分配于四个方位，即南蛮、北狄、西戎、东夷，这种认识对后世治史者影响不小。先生经过深入研究，破除了这种成说。先生以为，戎、狄、蛮、夷的含义，其实是随时代而变化的。早在殷商时，东方有夷，北方有狄，而蛮、戎二名尚未兴起。这四名也不是四个种族，《诗经》、金文中均有“百蛮”之名，蛮而有百，可知其非一族之专名。到春秋战国时，四方诸小族统名为“夷”，南方之族尚未专有“蛮”称。而且“戎”“狄”二名可以互称，文献中多有其例，可见不能把戎、狄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种族。直到秦统一中国之前，中原诸小族多被驱逐于四塞之地，戎、狄、蛮、夷四个名词才开始被分配于四个方位，“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始正式形成。

先秦史号称难治。难在哪里？首先难在材料的短缺。无米之炊，巧妇难为，故学者每有“文献不足”之叹。商、周两代比较起来，商代问题更为严重，文献资料极少。西周稍好一些，有《尚书》《诗经》等可资利用，但真正属于西周时代的材料也很有限。所幸近代以来，甲骨文、金文大量出土，为治先秦史者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这就要求治史者除了熟悉文献之外，还要懂甲骨文，懂金文，具备考古学方面的知识。王玉哲先生在古文字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对甲骨文、金文都有精深之研究。在《史纲》一书中，先生在商史的部分利用了大量的卜辞资料，在讲述商代国家的特点、奴隶的状况、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继统法等

问题时，卜辞往往被用作起决定性作用的骨干材料。其实这也是不得不然，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说清商代社会（主要是盘庚以后的商代后期）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但在讲西周史的部分，先生则仍然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为骨干。因为一来西周的文献较商代为多，利用文献资料构建西周历史的框架已有可能；二来在先生看来，青铜器铭文作为史料，有一定的局限性，使用起来必须慎重。例如对铜器的断代，学者间往往歧见甚多，搞不好就有张冠李戴之虞。再有就是青铜器铭文涉及的社会面比较窄，内容比较单调，有些问题如果完全依据金文或以金文为主来论证，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此外，金文的文字释读也是个问题。很多铭文当中的关键文字，在释读上往往还有很大争议，字义尚不确定，这种材料怎能放心使用？故按照先生的说法，对一件铜器铭文，“非有十分之见，不敢轻易利用”。所以我们看到，《史纲》中的西周史部分，还是以传统文献为本，而利用一些意思明确、争议不大的铜器铭文来补苴罅漏。

以传统文献为主来讲古史，其实也不简单。且不说上古文献之文字艰深、佶屈聱牙，单是史学与经学纠缠在一起，就是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先秦文献如《尚书》《诗经》《周易》《仪礼》《周礼》，等等，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自汉以来，说解虽多，但大都以解经为目的，故现代学者利用起来，首先就要廓清经学的迷雾，分辨出古人的解说哪些是主观的解经，哪些是客观的述史。这是很能考验治史者见识的事情。先生在这方面也有其独到的眼光。例如关于周代的宗法制，先秦礼书里有大量的记述，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些是当时实际的宗法规则，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经师的发挥，或者是想当然的理想化设计。汉以来历代学者解说周之礼制、解说宗法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现代学者必须从大量的说经之作中披沙拣金，挖掘古人之说中那些真正反映周代历史实

际的东西。《史纲》在讲解什么是大宗、小宗，什么是继祖、继祚，什么是百世不迁、五世则迁等问题时，就基本上以先秦礼书为根据，因为先秦礼书上的这些记述，就我们现在的认识水平来说，可能确实是周代宗法的主要规则。同时，在这一基础上，《史纲》又从现代学者观察的角度，将宗法制的特点归纳为“共同的祀典”“亲族服丧”“异居而同财”“族人会议”“同宗不婚”等五个方面。这样，所论既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又有现代学者的理性分析。又如对“井田制”的解释，也特别能反映作者的识见。井田制问题是先秦史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究竟有没有井田制，井田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时至今日，学者的意见也还没有统一。古人言之凿凿，甚至把它描绘得十分细致，但是现代学者却总不肯完全相信。传统文献中不止一处发现有关于“井田”的线索，完全否认上古存在过井田制，恐怕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真像孟子描述的那样，“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又无论如何不能让人相信，因为世间不可能存在那种整齐划一的豆腐块式的田地制度。《史纲》则从被历代经师搞成了几乎是一团乱麻的井田诸说中，抓住了可以称之为井田制本质要素的东西，那就是“劳役地租”。作者指出，封建领主用劳役地租的方式来剥削农民，“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这不是任何人可以空想出来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所谓“公田”，实际上就是“官”的私有田，这样就把井田制与作者所主张的西周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联系起来。

先生是一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他盛年之际，迎来了旧政权崩塌、新政权建立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先生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由衷地欢迎这个新的政权，同时也真心实意地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

态的学说，深为他们这一代学者所服膺。先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来思考中国上古史问题的。但先生从来不会盲从，不会把教条、原则作为出发点。他信奉“论从史出”，在研究中绝不先给历史带上某种框框，而是主张先去发现历史的真相，然后从大量的真相中去提炼历史的发展规律，来验证理论指导的正确性。有时他的观点不为多数人所赞同，但他既自认为是从事实中来，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则持之益坚，不为潮流所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写先秦史著作，最要紧的也是最不能回避的，就是社会形态问题。先生是坚定的西周封建论者，他积极参加了那场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在《史纲》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证，首先是着眼于西周的土制制度。先生认为，天子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领主，他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让他们各自为政，各自治理他们的封地；而诸侯在国内，也同周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以采邑，这样就形成了等级制的各级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这一基础上，《史纲》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生产者身份上。大量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西周的主要生产者“民”（或庶人、庶民）不是奴隶，他们有自己的小块耕地，有自己的少量劳动工具，他们一方面受劳役地租的剥削，同时也有自己的经济生产，这样的劳动者，已经与奴隶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西周社会已不可能是奴隶社会了，按照先生的说法，西周“已经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要加上“初期”二字呢？因为先生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西周社会还存在着许多奴隶社会的遗迹，例如《逸周书》上所反映的周初对敌人“重俘虏而不重杀戮”的现象，某些金文中还记载有奴隶买卖的实例，等等，他认为，“一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之划分，绝对不是像刀切斧斫的那样整齐”，“两个阶段之间，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新旧两种社会形态交错存在”。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精当的。

关于商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先生的见解也与多数学者的看法不一样。先生不否认商代存在着奴隶制，但他说，盘庚以后的商王朝才能说是奴隶社会，而商代初叶，距原始公社的末期还不甚远，应当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经过长期的发展，至盘庚时期，商人才进入奴隶社会，国家机构才正式形成。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对盘庚前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了深入分析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对盘庚迁殷的原因的探索。在先生看来，商人屡迁与当时的粗耕农业直接相关，而盘庚以后 273 年不再迁都，则是由粗耕农业转为半精耕农业的证明。所以，盘庚迁殷，称得上是商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观点，虽然未被主流学界所接受，先生却直到晚年仍在坚持。我想，今日的学者，即使不完全赞同先生此说，亦不妨认真看一看先生的论证，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史纲》一书的初稿，实际上在 1955 年前后已经完成了，故此书可以看作是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的作品。毋庸讳言，在今日看来，此书的有些内容确实已经过时或者应该修正了。例如原始社会部分，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发展突飞猛进，使这一部分的许多内容都显得陈旧了。甲骨学、金文学的长足进步，也为先秦史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史料。此外，如今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也是当年的学者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今日再版此书，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这本书在不长的篇幅之中，讲述漫长的先秦历史，脉络清晰，史实准确，史料精而不繁，论证约而有法，既有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成说，又有作者的创见，对于治中国史的学人来说，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参考书。而且此书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严谨学风、朴实文风，对今日浮躁的学术空气不啻一剂对症的良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书是老一辈学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那样一种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理论指导先秦史研究的可贵实